

序

邹振环

我与钦永兄的第一次晤面，是2007年春天在香港召开的纪念马礼逊牧师来华二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我正在校改《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的书稿，而他也正在筹划撰写《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一书，我们相谈甚洽，有许许多多共同的话题。我得知他曾先后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工作，期间曾完成过多种有关新加坡华人史的研究论著，退休后再入南洋理工大学深造，2006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这种特殊的履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曾自比学界的“矿工”，有在浩瀚的沙海中爬梳文献、披沙沥金的爱好，每每在文献沙石中淘出一两种佚文或他人不知晓的版本，常常喜不自胜，谈起这一点，钦永兄与我有强烈的共鸣。以后我们多次在上海、大阪、北京等学术研讨会上相聚，虽然我们都不好酒，但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他研究郭实猎有年，收集和整理了这位普鲁士籍传教士的多种汉文著述，此次他在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种学界全然不知晓的另一种历史体裁的《大英国统志》（本书中命名为《大英国统志（利兹）》本），并将此历史体裁本与学界熟知的小说体裁本《大英国统志》（本书中命名为《大英国统志（燕京）》本）合并研究，本书上编是这两个不同文本的互文性研究，下编则是上述两个文本的点校和注释。

郭实猎48岁不长的一生，在华活动时间长达20多年，留下了英、荷、德等多种文字著述，其中以汉文著译为最，在全部各种文字的87种著述中，汉文著译多达63种。大多属于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涉及世俗的著述主要有叙述世界史地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

集》和《犹太国史》，介绍西方国际贸易等制度的《贸易通志》和《制国之大用》等，以及反映英国商人对广州贸易制度不满的《是非略论》等。他的大部分汉文著述都由新嘉坡（新加坡）竖夏书院出版。作为普鲁士籍的新教传教士，郭实猎为何要花费大力气来写两本同一书名的《大英国统志》呢？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西方列强”，主要是欧美国家，而英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英国不仅在对华贸易上占有最大的份额，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也大大先于和大于其他列强。然而，虽然在17世纪初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已经有了英国的介绍，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对英国的了解非常有限，起初将英国与“红毛番”的荷兰混淆，视为“红毛夷”，18世纪汉文文献中的“英机黎”、“英吉利”的发音，可能来自葡萄牙语，因此即使关心西方的中国知识人也不太容易将“英吉利”与“红毛夷”辨析清楚。

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在传播西学知识上有一个外人担任传播主角渐渐向华人担任传播主角的转变，和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倾心介绍西学的情况不同，19世纪初中国人还有着强烈的天下观念，这一时期甚至尚未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之处，中国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之前徘徊在中国“大门口的陌生人”则正在为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四处奔走。虽然1830年代，郭实猎就到处声称“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但大多数传教士仍然清楚这只是危言耸听。为了让大门内的主人了解大门外陌生来客的身份，他们通过行医、兴学、办报、印书等不同的传播西学的方式，积极自荐和互荐。这些来到中国大门口的传教士都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教会教派，很多外国商人还有自己的某些利益的需求，但在打破中国传统天朝中心主义堡垒和化解中国人文明独尊这一点上，这些外人却不谋而合。这是1834年查顿出资邀请怡和洋行雇员郭实猎撰写《大英国统志（燕京）》本的由来，该书究竟刊刻于广州还是澳门，目前尚未确定，而《大英国统志（利兹）》本则经钦永兄考订是1838年底与1839年底之间在新嘉坡（新加坡）竖夏

书院出版的。钦永兄大著所描绘的正是这个西学东渐史初期由外人担任主角并急于自荐和互荐的时代。

郭实猎出生在普鲁士，青年时期求学于德国柏林和荷兰，之后加入了荷兰传教会，并奉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在巴达维亚等地向华人传教。郭实猎性格独特混杂，不到30岁即断然脱离荷兰传教会成为一名独立传教士。他懂得德文、英文和荷兰文，来到亚洲后，又学习了中文、马来文、泰文和日文。他给自己起了笔名叫“爱汉者”，声称自己在过去十多年来已是一个中国公民，为郭姓宗族接纳，改用中国人的姓名。1831年新婚夫人去世后，孑然一身的郭实猎，开始了在华不光彩的间谍生涯。他携带了航海图和测绘仪器，穿上了中国服装，住进了中国货船水手的船舱。在经过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海、天津的一路上，他记录航海路线和港口水域的情报，利用向中国人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了解各口岸的民俗风情和经济情报。1832年郭实猎作为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的译员和外科医生到中国沿海作了又一次侦察航行。前后七次沿海航行，使其具有丰富的中国沿海的航行知识，也很快成了鸦片商人眼中的红人，1835年他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后来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并在起草和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都给这位经历奇特的传教士添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西方传教士内部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传教士。我想凡是对近代西学东渐史感兴趣的读者，都会急于打开钦永兄的大著，看一看这位有着复杂经历的传教士，如何用同一个书名写下的两种体裁不同的《大英国统志》。

是为序。